

# 民国出版史视野中的世界书局

邹振环

20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读者,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普及小丛书。较之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为早,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

## 一个正在淡出民国出版史的书局及其书局创办人

世界书局曾经是民国出版史上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驾齐驱的三大出版社之一。但是这些年来研究出版史的重点大多聚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曾经风云一时的世界书局正在渐渐淡出民国出版史研究者的视线,据笔者眼界所及,迄今世界书局至今既无一本图书书目,亦无专门讨论世界书局的学术论著,早期《全国文史资料》上有十余篇世界书局老职工,如朱翊新、刘廷枚、胡山源、程小青、邱中和、刘季康的人回忆文章,朱联保据说编有《世界书局资料汇编》,但至今似下落不明。真正属于研究论文的少之又少,从1987年朱联保的《上海世界书局历年大事记》到2016年范军等所撰的《论民营出版企业资本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营的影响——以上海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为考察中心》,中国网上能查到的近30年来以

“世界书局”为题的论文不到20篇,硕士论文仅2篇,博士论文则0篇。同样,以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一名在中国知网检索,2000年以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仅4篇,且都非专门性的研究论文;硕士论文2011年至2016年有4篇;博士论文也是0篇。这些信息虽然不能说完整,但大致反映了学界研究世界书局及其创办人的一般状况。

沈知方(1882—1938),这位具有敏锐市场嗅觉、聪明能干的浙江绍兴人,1900年在商务印书馆当跑街,同时他又与王均卿创办了国学扶轮社,该社1911年出版的黄人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辛亥革命成功后,沈知方与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华书局,推出新的民国教科书,一度曾使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中华书局副经理的沈知方由于过多订购纸张,造成经济周转不灵,遭到董事的攻击,为了躲避洋行的索款,被迫离开中华书局,隐居苏州,甚至诬称已经病逝。1917年他又偷偷地以中国第一书局的名义和世界书局的名义出版书籍,实践证明,用世界书局的名义

出书销路较多。随着社会上知道世界书局的人越来越多,沈知方觉得“世界”这一名称有全球之意,比中华只是一国的名词范围更大,于是之后出书只用世界书局的名义了。

## “红屋”规模

世界书局最初被沈知方个人非正式使用过,最早以“世界书局”名义推出的可能是1916年私自刊印的向恺然(不肖生)《留东外史》。大约在1920年5月正式建局,发行图书,1921年沈知方将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22年正式以“上海四马路中市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发布广告,称“优待全国学界,新书只售对折”。世界书局最初的地址在上海四马路昼锦里口对门萃秀里,1920年8月27日起迁往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怀远里口租得店面,漆成红色,自称“四马路红屋世界书局”,时人简称“红屋”,与该局推出的严独鹤创办的《红杂志》《红玫瑰》杂志等遥相呼应,颇受世人瞩目。

初期设有营业部、信托部、



《红玫瑰》和《红杂志》



会计部、分局事务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等,可谓规模初具,在闸北香山路及虬江路还设有编辑所、印刷厂,又设分局于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全局共有职工百余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李石曾到上海接管世界书局,并招收新股,改选董事会,由杜月笙为董事长,李石曾担任总经理,1949年上海解放,成立历史管理委员会,因涉及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接管,至1950年停业,世界书局前后延续了约30年,前后共出书约5580余种。

初期经营的岁月里,由沈知方任总经理。初期以出版通俗小说为主,之后也出版了一

批文白对照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学生作文、尺牍范本,以及商业所用的公文书式等书,适应了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的需要,颇受学生的欢迎。此外也出版了一些名人传记,如《孙中山全传》《模范军人冯玉祥》《当代名人轶事》等。20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读者,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

(下转12版) →

← (上接10版)

旧刻、明清精刻、稿钞校本,通栏或四拼一影印;中华书局有《四部备要》(1921—1934),351种,选择古代要籍,用聚珍仿宋字体排印。两套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世界书局与古籍出版亦颇有渊源,出版物中有不少是古代典籍,如《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四史”、《资治通鉴(附胡三省辨误、刘恕外纪)》、《续资治通鉴》、《诸子集成》、“国学名著丛书”、《昭明文选》、《元曲选》、“历代古人诗词专集”等。以商务、中华为竞争对手,世界书局开辟新路,走出了一条与

两者不同的古籍出版路径。

世界书局古籍出版在以下几个方面另辟蹊径。

其一,并没有与商务、中华在数量规模上比拼,而是将出版对象集中于文史学者的通用书与普通读者的基本书。照陆高谊的说法是:商务、中华好比“全桌筵席”,世界书局是“点吃名菜”。

其二,在呈现形式上影印与排印并举。我们知道,影印古籍的优点是保存原貌,文本可信;排印古籍之所长则在于清晰规范,适宜阅读。商务的《四部丛刊》因选用善本影印,运用现代印刷技术使得珍稀藏本化身千万,对专业学者而言因此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利用,功德匪浅;中华的《四部备

要》采用排印方式,相同字体,相同版式,美观划一,符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其缺陷是文字有可能排错。世界书局的做法是,对文史学者的通用书取影印之法,但不同于《四部丛刊》的通栏或四拼一,而是九拼一缩印,并做详细书口,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用一二册精装就可容纳,方便翻检携带,亦可降低定价,郑振铎称赞为“价廉方便有用处”;对普通读者的基本书,购书者重阅读体验,则取排印之法。

其三,提高整理程度。世界书局出版的古籍大多加上断句,哪怕是影印本亦施于圈点,对阅读理解极有帮助,这是胜出商务、中华的地方。

举一例而言,阮元主持校

刻的《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世界书局于1935年影印出版,精装两巨册,九拼一,加书口,经文断句。作为经部第一要籍,《十三经注疏》使用面极广,世界书局本一出,即成为最为通行的本子,虽不能说文史学者人手一册,但肯定是不可或缺。中华书局、我们上海古籍出版社皆曾据此重版。时至今日,北大出版社有了《十三经注疏》的标点本,我社也有了其中8种的整理本,但因标点质量问题,或尚未齐全,世界书局本仍为相关学者案头所必备。

由此可见,即便仅从内容创新来说,发现新需求,开发新产品,哪怕是形式上的最为细微的创新,也会给图书带来新的持续的生命

力。上海出版业的繁荣可以说因此而来。

1949年后,尽管北京因不可撼动的政治文化地位取代上海迅速成为新的出版中心,但上海仍保留了相当的出版资源优势。上海出版业有着创新的传统。商务印书馆拥抱最新的印刷技术,开启了近现代出版业的先河。继之而起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在方方面面推陈出新,持续推动着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也积淀下了上海出版业的优秀传统。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世界书局成立100周年,回望先辈们的业绩,我们理应继承传统,方能开拓未来。